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 “一带一路”中国海外园区研究：进展、挑战与展望\*

孟广文 王苒 王淑芳

**摘要:**中国海外自由经济区(境外经贸合作区、海外园区)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空间载体和对外投资新模式,不仅促进了中国的产业转型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也促进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技术进步以及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有关海外园区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并取得较大进展,但有关其发展演化、面临挑战和未来研究方向仍缺少系统性研究与探讨。作者基于中国知网(CNKI)、科学网(WOS)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研究,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外园区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回顾。结果表明,现有海外园区的研究主要包括基于类型与案例视角的归纳综合研究、基于文化和制度变迁视角的演绎研究、基于国际贸易和区域经济视角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城市规划视角的规划融合研究以及国外学者和国际经济政治研究与评价。尽管研究内容多样,进展显著,相关研究仍存在中国海外园区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与机制探索、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应对国外学者的关注和质疑等问题。未来海外园区研究应拓宽海外园区研究视角,拓展国内外合作渠道与网络,完善理论框架构建与案例研究,总结归纳出适用于不同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下的海外研究一般性结论,服务“一带一路”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海外自由经济区;境外经贸合作区;海外园区;系统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5-0147-14 **收稿日期:**2024-06-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建立中国自由贸易港区理论与案例研究”(41971161)。

**作者简介:**孟广文,男,天津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天津师范大学自由经济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

王苒,女,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讲师(天津 300071)。

王淑芳,女,天津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教授,硕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

## 一、引言

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仅促进了包括中国、东道国甚至世界在内的经济的显著增长,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成为探索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参与区域合作和全球化的重要平台(刘卫东等,2018)。截至2022年,中国已与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就“一带一路”合作签署正式文件(中国社会科学院,2022)。商务部报告称,截至2022年,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累计投资超过

570亿美元,向东道国缴纳税费超过66亿美元,为当地创造近42.1万个就业岗位。随着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关注度的不断上升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针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学术研究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新尝试,海外自由经济区(简称海外园区)包括境外经贸合作区、海外工业园区、海外自贸区、海外农业产业园区、海外科技园、海外经济特区等不同名称。其定义如下:为实现投资国和东道国政治经济目标,投资国投资方单独或者和东道国合作,在东

道国建立并通过物理性与技术性隔离被严格限定在一个特定地理范围内的,具有完善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享受财政与行政管理特权,开展经济贸易活动的特殊经济园区的总称,简称海外园区。此外,面对后疫情时代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和地区冲突的影响,海外园区不仅可以作为中国企业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中地位的平台,也可以成为东道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驱动力,然而,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境外经贸合作区也有一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如地缘政治的工具、不透明的决策过程、债务陷阱和环境问题的挑战。现有文献对于海外园区的系统性梳理与评价研究相对匮乏,而总结其最新进展、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趋势对“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与理论体系构建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海外园区相关研究涉及地理、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规划等多个学科领域。本文以中英文文献为基础,总结与探讨了“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研究的进展、问题和未来研究方向。

## 二、研究方法

系统综述是对现有科学研究进行梳理的有效方式(Haddaway,et al., 2015)。本研究采用Moher等人(2010)提出的方法(PRISMA statement)对海外园区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分析。该方法主要包括识别、筛选、合格和分析四个步骤。

首先,在识别阶段,使用关键词检索学术文献数据库,识别潜在的相关研究。本研究选择了两个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网(WOS)作为搜索引擎,因为它们包含多学科领域的同行评审研究文章。使用“一带一路”或“海外”关键词筛选具有特定地理位置(国外地区)的研究。研究内容将“overseas free economic zone”(海外自由经济区)、“overseas free trade zone”(海外自由经贸区,自由贸易区)、“OETCZ”(境外经贸合作区)、“overseas industrial park”(海外工业园,境外工业园)作为搜索标准。文章类型为同行评审研究文章,不包括会议论文和摘要。研究论文的发表年份范围被确定为最近12年(2010—2022年)。其次,在筛选过程中,通过检查标题、摘要和关键词,手动删除与研究关注点无关的文章。再次,对前两步筛选出的所有

记录进行审查,包括整个文稿,以选择最符合要求的论文。最后,对相关文献中的必要信息进行提取、加工和讨论。

本研究除系统回顾外还采用实地调查与访谈法,搜集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与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实地调查和访谈主要在非洲、欧洲和亚洲地区的海外园区进行,并利用相关结果讨论海外园区相关研究中的进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趋势。

## 三、研究成果

按照上述方法,筛选出2010—2022年的138篇关于海外园区的中文论文和25篇英文论文。我们发现,2010—2021年,中国文献数量呈显著上升趋势(见图1)。这一增长趋势表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新的海外投资试验——海外园区越来越重要。然而,关注中国海外园区的英文文献数量相对有限,说明国外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此外,在学科类别方面,大多数论文发表在与地理、经济、城市规划、国际和区域贸易、环境科学和国际事务有关的期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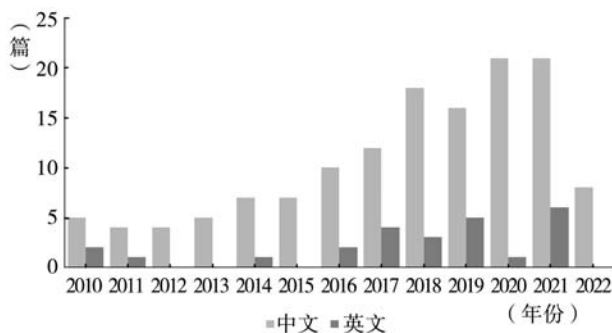


图1 2010—2022年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相关的中英文文献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本文进一步利用VOSviewer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确定主要研究重点和常见研究主题(见图2)。节点大小表示文献中出现的术语频率,连接线的粗细度表示不同术语之间的连接强度。结果表明,关键词“境外经贸合作区”“一带一路”“海外工业园区”是所有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值得注意的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以往研究中作为关键词出现最频繁;“一带一路”的出现频率排名第二,主要与贸易效应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有关;“海外工业园区”排名第三。此外,根据文章关键词及摘要,海外园区相关研究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贸易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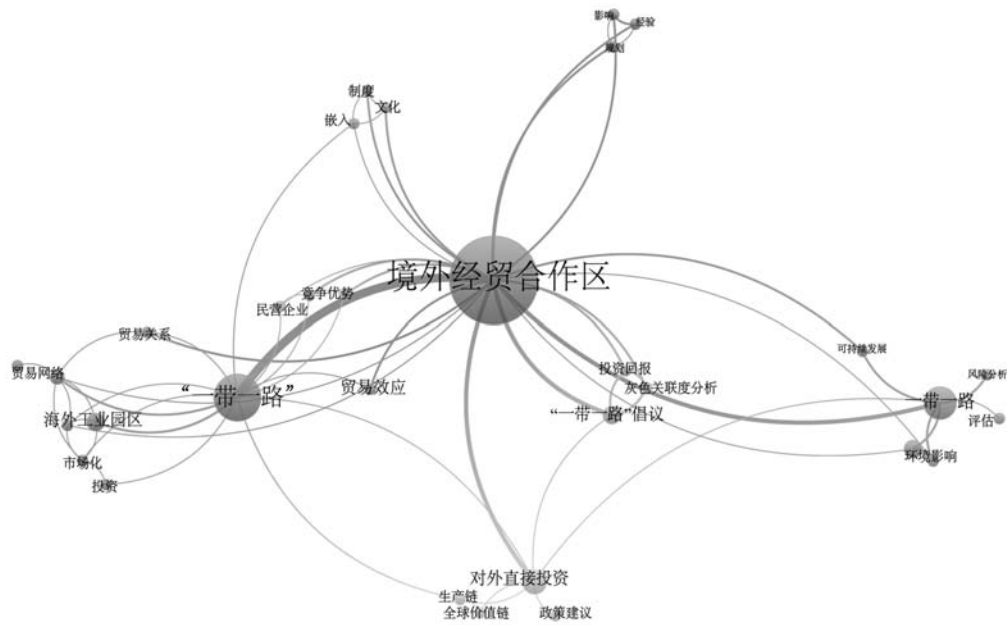


图2 2010—2022年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相关的收集文献中关键词共现分析

注:节点大小表示每个关键字的出现频率。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制度和文化的作用、海外投资、空间规划、环境影响。

海外园区数量众多,需要分门别类与选择典型案例,按照总结归纳范式得出普适性研究成果。本文以地理学、经济学、城市规划、国际政治、区域与国别研究等跨学科研究视角为理论基础和方法,分别从类型与案例研究、制度和文化变迁、国际贸易与区域合作、城市规划、海外经验和国际地缘政治等视角,对海外园区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探讨。

### 1.类型与案例研究视角

分析海外园区研究的前提是区分其不同类型,总结海外园区的主要特征。部分学术机构学者探

索了海外园区的各种分类标准(孟广文等,2017;2018;2019;2020;张菲,2013;叶尔肯,2017),研究表明,海外园区的分类以主导产业为主,以建设模式和治理结构作为辅助分类标准(Meng,2003)(见表1)。

第一,基于主导行业的分类。从产业视角来看,海外园区包括五种类型,即:加工制造型、农业型、商业和贸易型、科技型、综合型(叶尔肯·吾扎提等,2017)(见表1)。以加工制造为主的海外园区主要发展纺织、机械、电子、化工和建材等轻工业(沈正平等,2018;张菲,2013)。由于投资较少,回报较

表1 不同类型海外园区的类别、特点和案例

分类标准	类别	特点	案例
主导产业	加工和制造型	主导产业:轻工业,如纺织、机械、电子、化工等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
	农业型	主导产业:农业及相关加工和贸易	中—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
	商业和贸易型	主导行业:物流、仓储、运输	吉布提国际自由贸易区
	科技型	主导产业:新技术和新产品	中国—东盟北斗科技园
	综合型	主导产业:综合性产业	中白工业园
建设模式	绿地	从荒地开始规划,但投资多,时间长	越南龙江工业园
	园中园	利用已有开发基础,尽快形成开发规模	泰中罗勇工业区
	前港—中区—后城	把物流—加工制造业和城市发展相结合	瓜达尔港自由贸易区
治理结构	政府主导型	来自政府的大力支持,对国家间的合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
	开发商主导型	丰富的工业园区建设和运营经验,将成功的制度和政策转移到当地园区	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私人企业主导型	运营机制灵活,产业多元,多数园区均由私营企业主导	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快,这种海外园区主要位于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典型案例是越南龙江工业园(孟广文等,2019)。在国际市场中,欠发达经济体为工业园区提供优惠税收等优惠政策,有助于中国扩大海外市场,打破贸易壁垒,同时,东道国利用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有助于其创造就业和赚取外汇。一般而言,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海外园区为当地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市场做出了显著贡献(姚一涵,2021)。

以农业为主导的海外园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主要是利用当地丰富的土地资源,包括种植、采购、加工和储存农业资源以及进行国际贸易。以农业为主的海外园区一般投资大,对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也普遍较高,但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扶贫工作有利。然而,由于投资的回收期较长,往往存在财务紧张问题。典型案例是中—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于淙阳,2020;周俊等,2024)。

以商贸为主的海外园区主要从事产品运输、储存、配送、配送加工和贸易。这种海外园区往往享有自由贸易政策,通常位于或靠近重要的港口或交通枢纽。吉布提国际自由贸易区就是一个例子(马祥雪,2020)。吉布提国际自由贸易区(DIFTA)位于亚丁湾西海岸,是东非国家的重要战略门户。按照“前港—中区—后城”模式,该园区规划成为东非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和航运枢纽,重点建设港口、物流园区与出口加工区以及配套城区。

科技型园区以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为主。大多数科技型园区都位于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道国或者地区,如中国—东盟北斗科技园。

除上述四类外,综合型海外园区的出现是因为单一功能无法满足需要具有多元化产业发展需要的园区,通常具有上述四类园区两种以上的功能,例如,中白工业园(Meng, 2003; 沈正平等, 2018)。由于功能齐全、多样,综合型海外园区一般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能够更好地满足东道国多样化的战略需求,但也存在投资大、周期长等问题(赵钊, 2019; 孟广文等, 2017)。

第二,基于建设模式、治理结构和位置的分类。从建设模式来看,海外园区可分为:绿地模式、园中园模式和“前港—中区—后城”模式。绿地模式有利于全面规划,但投资和时间成本较高;园中园模式促进了规模效应和生产率的提升;“前

港—中园—后城”模式将物流、制造业和城市发展结合起来。根据空间结构,海外园区也可以分为单区模式和复区模式(梁育填等,2021;孟广文等,2020)。单区模式适合早期小规模的开发建设,而复区模式适合大规模和后期建设发展。

学者们还基于其他标准对海外园区进行了分类。根据治理结构,海外园区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园区开发商主导型和私人企业主导型(马学广等,2019)。根据行政管理水平,海外园区有国家、省级和地方主导园区三大类型(王爱华,2013)。根据地理位置,海外园区还可分为沿海、内陆和跨境类型,例如,西河努克港经济特区、老挝万象赛色塔开发区、中国东兴—越南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等。

## 2.制度和文化的变迁视角

除从类型和案例研究视角研究海外园区的归纳法外,用地理学中文化和制度转型视角的演绎法也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献。学者们指出,尽管中国的“走出去”政策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海外园区往往忽视了中国与当地国家之间的制度和文化的差异(Liang, et al., 2021; 刘卫东等, 2020)。近年来,学者们运用制度、文化转型理论分析海外园区的机制、经验和挑战,以及外资与地方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高波阳等, 2020; 刘卫东等, 2020; 宋涛等, 2020; Song, et al., 2018; 王姣娥等, 2020),这些研究为建设海外园区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一,制度和文化与多尺度嵌入。研究者指出,制度和文化的变迁作为海外园区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地理嵌入性的广度和深度来表示,即指项目的占地面积及其对当地环境的影响程度。刘卫东等(2020)总结了“一带一路”的四种海外项目——改革性项目、配套项目、综合项目和海外经济特区。一般而言,地理嵌入性越高、主导产业作用越显著,建设海外园区时就越要重视制度和文化的差异。

当从制度和文化的变迁视角分析海外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时,多尺度嵌入是另一个分析视角(刘志高等, 2020; Liu, et al., 2021)。学者们将“全球—国家—地方嵌入”的框架应用于海外园区(如缅甸莱巴东、中白工业园),揭示了外资与当地制度和文化的互动的机制。研究发现,影响海外园区顺利发展的主要制度和文化的因素各不相同。许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特点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不稳定,而与弱势的地方政府合作,并不能确保海外园

区的稳定发展,因此,学者们强调了海外园区多尺度嵌入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的必要性。

第二,制度和文化与对外投资。此外,一些研究还从制度和文化视角分析了海外园区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赵赛(2022)使用来自中国和6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建设良好的制度(如政府效率高、腐败少、健全的法律体系)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呈正相关。陈伟等(2020)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从制度和文化视角揭示了海外园区对中国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加强海外投资的主要制度和文化因素包括政策协调机制、投资的软硬环境、信息和资源共享以及集聚经济(Wang, et al., 2021)。然而,该制度和文化在通过海外园区发展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第三,技术转让和政策流动性。一些学者指出,在海外园区建设和运营中经常存在“技术转移”(王姣娥等,2020)。技术转让的难度取决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和文化的差异,以及技术对制度和文化的依赖。学者们建议,对于铁路等革命性项目,推荐“技术—制度—文化”综合模式,包括完善法律制度,适应当地文化,升级技术标准和管理制度,产业链本地化管理。除技术转让外,相关政策也在海外园区发展过程中从中国转移到东道国,这种转移被称为“政策流动性”(宋涛等,2020)。税收、外汇和土地使用政策是国内经济特区较为成功的政策工具;这些政策从中国转移到东道国,并进行本地化,以适应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王淑芳等(2022)用案例研究和比较方法来分析国内外自由经济区的政策制定,结果表明,环境保护政策、规划、运营、管理的人才和经验可以直接转移到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此相反,发展模式和文化政策需要修改,法律、法规、优惠政策需要全面重新设计。Song等(2021)利用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视角——政策流动性、伙伴关系和行动者网络来探讨多方参与伙伴关系在海外园区政策流动性中的作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伙伴关系和行动者在政策流动中会严重影响技术转让的有效性。

另外一些学者试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分析政策、策略及其制定者如何促进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构建。Liu, et al.(2021)以中国和白俄罗斯共同开

发的中白工业园为例,考察了两国及其最高领导人的战略目标耦合在以各方都期望受益的方式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中的作用。

### 3.国际贸易与区域合作视角

海外园区的优势之一是打破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促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从国际贸易与区域合作的角度,研究者从双边贸易关系和贸易网络方面分析了海外园区的作用。

第一,对双边贸易关系的影响。海外园区通过影响贸易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卢进勇等,2019;孟广文等,2019;孙冰等,2022;徐俊等,2020;严兵等,2021;周建军等,2020)。徐俊等(2020)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海外园区对双边国家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海外园区通过直接扩大贸易规模(直接“贸易效应”)和通过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间接“贸易效应”)促进贸易合作来推动双边贸易。

此外,许多研究调查了海外园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李金叶等,2019;许培源等,2019;杨丽等,2020;支宇鹏,2019)。部分学者认为,海外园区提高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效率和规模(李金叶等,2019),也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孟广文等,2019),其基本机制包括优化制度环境、增强文化认同和加强双边投资条约,从而有效减少当地经济、文化、法律、政治背景对外商投资的障碍(许培源等,2019;杨丽等,2020;张宏等,2021;支宇鹏,2019)。

第二,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网络。学者们运用传统经济模型(如引力模型、投入产出模型)和网络分析,从整体结构、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和产品等方面探讨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网络的特征、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程中海等,2022)。研究人员根据物流效率、海关和边境管理、电子商务、监管体系、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等各种指标对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量,发现这些指标的改善有利于促进区域贸易网络的整合(陈继勇等,2018;孔庆峰等,2015;唐宜红等,2019)。许多研究也证实了中国与其经济伙伴之间贸易关系密切程度的上升趋势,但存在空间异质性(Song, et al., 2018;郑智等,2019;邹嘉龄等,2016)。中国是“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网络的中心,与东南亚贸易



关系最近,与中东关系相对松散(宋周莺等,2017;2018;王博等,2019)。中国与其他国家国际贸易的积极经济影响也显示出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中国沿海城市和地区通过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的邻国开展国际贸易而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增长。从影响因素的角度来看,贸易网络结构通常受经济规模、地理距离、贸易协定、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影响的强度和方向因地理位置而不同(程中海等,2022)。

大部分研究考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网络,聚焦于生产网络的研究却比较少。郑智等(2020)采用投入产出分析、增值分解和网络分析,分析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生产网络的演变过程以及对周边国家生产网络的经济促进作用。他们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经济重心的变化,区域生产网络不断加强;中国为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对当地经济的积极影响有效地驳斥了国际社会对这一倡议的负面评论。

#### 4.城市规划视角

“一带一路”不仅促进了中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与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也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且推动了中国的规划战略、方针、标准和技术“走向国外”(李磊等,2020)。除类型与案例、制度与文化变迁以及国际贸易与区域合作研究视角外,园区规划亦是海外园区研究的重要议题。一些学者认为海外园区规划研究为科学、系统、全面的海外园区规划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有利于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王兴平等,2021)。

第一,海外园区规划的经验教训。由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各种文化、经济社会条件、规划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同,海外园区规划与中国的城市与园区规划及其实施存在显著差异(王兴平等,2021)。总结现有海外园区的经验教训,有利于优化其规划并支持建立相应的规划系统。学者们总结了海外园区规划的类别、技术标准、制定和管理(见表2)。与国内城市规划类似,海外园区规划也可分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概念规划等类型,其中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是主要类别。由于海外园区通常是由东道国和中国共建,因此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采用了两国的规划技术(陈骁等,2019)。随着东道国规划理论和技术进

步,海外园区的规划技术标准已经从直接“复制”中西方标准转变到结合前者优势制定本地化的技术标准。海外园区规划通常由中国规划设计部门或中国和当地地方部门制定,双方共同负责海外园区的管理。

表2 海外园区规划在规划类别、技术标准、制定和管理等方面概要

内容	分类	案例
规划类别	可行性研究	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
	土地利用规划	印尼滨海公园工业园
	战略规划	马一中关丹工业园
	总体规划	泰中罗勇工业区
	详细规划	泰中罗勇工业区
	工业发展规划	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
技术标准	城市规划	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
	完全复制	柬埔寨西哈努克经济特区
	选择模式	中白工业园
制定	因地制宜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
	中国	中白工业园
管理	中国+东道国	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道国	适用于大多数海外园区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学者们还总结了以往海外园区规划的经验教训,包括:其一,适应当地环境的需要。一些海外园区采用中国城市规划体系和技术,与当地的政策、文化、地理、审美等方面不匹配。由于在空间上的飞地属性,海外园区缺乏与周围环境和城市的沟通。其二,缺乏系统的、全面的规划体系。迫切需要统一、系统、专业的海外园区规划指南(包括技术标准)。其三,缺乏规范。大多数海外园区将总体规划直接应用于地方规划和建设,但在土地利用分区、公共设施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需要明确的规划指标。

第二,海外园区规划的案例研究。学者们还根据具体案例,分析了与海外园区规划相关的问题。Wang(2019)分析了东南亚和南亚区域产业发展和海外园区发展的基本情况,系统介绍了这些地区重点工业园区发展和规划的条件,以及与海外园区规划相关的法律法规。作者进一步总结和讨论了具有重要战略合作意义的海外园区建设和规划的成就。除对海外园区规划案例进行全面的介绍、讨论和总结外,一些学者还研究了具体的规划内容或实施阶段。例如,赵毅等(2009)调查了柬埔寨西哈努

克港经济特区详细规划的内容和特点。Shen (2009)和李扬(2014)研究了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的海外园区规划的制定程序。Zhang等(2015)基于中白工业园案例,总结海外园区方案制定的共同特点。此外,国内研究人员指出了为海外园区规划建设指南和技术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在非洲(王骏等,2010)。Wang等(2017)讨论了中非六个合作开发区的现状及其与中国在工业发展中的差异,为非洲国家海外园区的规划和建设提出了发展战略和建议。学者们以中白工业园为例,从层次、类别、内容、主管部门、实施、公众参与等方面来比较中国与东道国的规划体系的异同(施一峰等,2019)。

#### 5. 海外经验和国际地缘政治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及其新的海外投资模式(即海外园区)对区域甚至全球经济、贸易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不断增强,越来越多来自海外学术机构的学者关注“一带一路”。海外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了“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的相关问题。

第一,对东道国、区域和全球的影响。大多数海外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都集中在其经济影响,研究对象通常是基础设施项目,而不是严格符合定义的海外园区(Inkpen and Pien, 2006; Bräutigam and Tang, 2012; Fardella and Prodi, 2017; De Soyres, et al., 2019; Gong, 2019)。世界银行审查了各外国直接投资的模式、决定因素和经济影响,并评估了共建“一带一路”对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发现包括,其一,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东道国,甚至非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其二,降低的运输成本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但影响程度因运输方式而不同;其三,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影响也随着东道国的发展水平而显著变化。De Soyres等(2019)基于全球和区域数据集,研究了“一带一路”构建的运输基础设施对装运时间和贸易成本的影响。与世界银行的调查类似,“一带一路”显著降低了其共建国家的经济体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

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共建“一带一路”对特定地区或国家的影响。Fardella and Prodi(2017)评估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欧洲,特别是对意大利的潜在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这种可能的影响因不同地区和行业而异——北

欧和中欧国家以及汽车和电子部门将获得更多的好处,然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下港口的发展可能会对意大利产生竞争。面对此情况,意大利需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或与之合作,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机会。Gong(2019)探讨了共建“一带一路”对东南亚的影响及其可能的驱动因素。主要发现包括,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将会增加,但限于特定区域。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东盟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反应,以及由日本、印度、美国及东南亚其他国家主导的替代基础设施项目的影响。Goodfellow and Huang(2021)以埃塞俄比亚和非洲的乌干达为例,探讨了中国海外园区对城市—产业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非洲政府、中国企业和其他地方部门之间的关系共同塑造了东道国城市的新城市主义。

第二,中国海外园区的经验和教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得到了海外学者的见证、分析、评估和认同。许多研究和报告总结了海外园区的成就、经验、挑战和教训(World Bank, 2011; Bräutigam and Tang, 2014; Corre, 2018; Maliszewska and Van Der Mensbrugge, 2019)。世界银行在2011年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海外园区经验总结的工作文件(World Bank, 2011),介绍了海外经济特区的概念、中国在非洲的海外经济特区(包括发展目标、投资结构、制度、现状、问题)、双边和三方合作及潜在的机会。世界银行认同海外经济特区对工业发展和创造就业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有经验和教训,如更好地调整政策目标,改进管理和运营,重视学习和知识共享,将区域总体规划纳入区域城市发展规划,制定社会和环境影响管理战略等。

此外,Fei and Liao(2020)探索了中国发展模式在非洲埃塞俄比亚的“着陆”,以及该过程中涉及的多个部门。他们认为,一个海外园区的发展是由政府、开发商、投资者和工人通过一个复杂的学习和互动过程所推动的。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的环境挑战和其他问题。尽管“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与贸易效应显著,但鉴于园区建设过程中可能涉及环境脆弱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张和升级,共建“一带一路”可能带来一定的环境问题(Ascensão, et al., 2018; Teo,



et al., 2019)。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的重要性,因此在2017年发布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生态环境部,2017)和《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生态环境部,2017)。研究主要集中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环境因素的空间分布和风险分析、建设项目对当地和区域环境的影响,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影响。例如,一些学者研究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资源或环境因素的空间分布格局,如天然气、土地、矿产、石油和其他资源(Tracy, et al., 2017),且主要集中在对这些国家的综合风险评估上(Andrić, et al., 2019)。一些学者对东道国的环境敏感地区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估,发现这些地区的环境问题通常是由建设公路、铁路、天然气管道和发电站等基础设施造成的。得出的结论是,共建“一带一路”可能会带来环境破坏,如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栖息地丧失、石油泄漏和水资源数量与质量的下降(Irina and Irina, 2016; Tracy, et al., 2017)。学者们也分析了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降水和温度变化对共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Hardiman, 2020)。除海外园区的环境挑战外,还有学者对海外园区其他问题提出了质疑,包括不透明决策、制造区域地缘政治工具和债务陷阱。

第四,新加坡和日本海外园区的研究。由于领土有限、对海外市场扩张和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需求,新加坡和日本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海外园区(关利欣等,2012;赵政原,2021)。以日本和新加坡为首的海外园区大多位于东亚和东南亚,主要利用这些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廉价且丰富的劳动力以及有利的贸易条件(赵政原,2021)。

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颁布了《区域2000计划》,大力鼓励外国投资。受此计划的激励,与政府相关的公司在中国、印度、越南、印尼和亚洲其他国家建设了数十个海外工业园区。相应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新加坡海外园区的研究要早于对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这些研究讨论了海外园区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并采用各种理论和模型来考察或评价这些园区的发展。从贸易和投资的角度,Phelps and Wu(2009)研究了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国家、多国企业和中间商在新加坡海外园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参与情况。Yeoh等(2004)发现,海外园

区给企业带来的低成本投资的吸引力被高估了,当地的社会政治不确定性给新加坡的海外园区带来了巨大影响。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学者们讨论了地方尺度和全球尺度的经济战略或活动对新加坡海外园区的影响,如地方企业政策(Pereira, 2004)和域外化战略(Phelps, 2007)。在新加坡所有海外园区中,新加坡苏州工业园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受到了海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一些研究对新加坡苏州工业园的发展进行了评估和分析(Wong and Goldblum, 2010),并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帮助(Zeng, 2016; Zhao and Farole, 2011; Pereira, 2004)。此外,研究人员以新加坡苏州工业园为例,揭示了过渡性政策转移的演变,促进政策转移成功因素以及对其他海外园区的政策启示(Inkpen and Pien, 2006; Lim and Horesh, 2016; Liu and Wang, 2018; 2021; Miao, 2018)。

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后,日本的劳动力成本和租金大幅上涨,因此日本企业将其投资目标转向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和印度等国家。与新加坡海外园区的相关研究类似,日本海外园区的相关研究亦主要关注由日本政府或企业领导的海外园区的发展程序、建设模式、投资经验、知识转移等(Kumar, 2001; Pak and Park, 2005; Jiang, 2019)。例如, Pak 和 Park(2005)以中国和美国为例,考察了日本在东西方两个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作者指出,内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三优势理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基于知识的观点可以解释日本海外企业的地理偏好。随着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海外园区数量的增加,日本和中国海外园区之间的竞争已经出现(赵政原, 2021)。Jiang(2019)考察了中日在海外投资中采用的发展融资方式,确认了它们之间的“竞争伙伴关系”;日本和中国一样,注重实体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注重适应东道国的实际环境。

与日本和新加坡相比,中国在国家制度、经济发展、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然而,这三个国家都是亚洲的重要经济体,共享儒家文化,并通过发展海外园区来拓展海外市场。对日本和新加坡海外园区的研究,为中国提高共建“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的发展水平提供了宝贵的指导、经验和教训。



#### 四、问题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部分从东道国基本国情与地缘关系、中国海外园区理论框架、海外园区比较研究与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论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海外园区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 1. 东道国基本国情与地缘关系研究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学术界重点关注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如何适应全球化需要,以构建一个日益开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学术界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远远滞后于中国的企业走向海外的全球化步伐,不能满足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治理的需要。

基于中国学术界海外研究转型积累和经验的不足,需要选择既能满足“一带一路”建设迫切需要,也要能够从容易开展的领域入手,“一带一路”海外园区与投资成为中国学术界服务国家战略的切入点。首先,海外园区是“一带一路”建设产能合作的平台,对促进中国各类型自由经济区建设经验传播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促进东道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研究有利于学术界用熟悉的语言和经验,跟随中国企业海外全球化步伐,总结海外园区建设与投资经验,探索自由经济区以及对外投资理论,逐步建立起深入东道国的学术网络与渠道,达到以“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研究为切入点,逐步拓展服务国家全球化战略需要的海外研究,即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目标。

基于相关研究现状不难发现,目前尚缺乏从中国学者视角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资源环境等基本国情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很少有研究关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地缘关系。因此,未来对海外园区相关的研究应更加关注东道国基本国情研究和中国与世界主要热点地区的地缘关系研究。

##### 2. 中国海外园区理论框架探讨

以往对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体现在分类标准、制度和变迁、国际贸易影响、城市规划、国际政治和海外经验等多个方面。尽管研究视角多样,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一,关于海外自由经济区的定义和类型仍存在语言和概念上的模糊。当前学

界存在至少20个不同的术语用来定义海外园区,极易导致语言上的不确定性和概念分类上的模糊性(Meng, 2003)。其二,需要增加用于案例研究和类别分类的样本数量,以提供充足的样本来总结各种海外园区的特征。其三,在从文化和制度转型的角度进行与海外园区相关的研究时,主要是验证国外相关理论,但是缺乏新观点。其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研究很少讨论应用和微观尺度研究。其五,中国基于理论和经验的海外园区规划模式面临着和东道国规划系统应用和融合的挑战。因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第一,海外自由经济区应作为一个统称(简称海外园区),以涵盖所有海外园区类型,因为它可以概括其主要特征,例如作为母国和东道国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工具,实行母国和东道国双重管理模式,享有经济“自由”和行政特权,这种自由和特权被严格限制在东道国某一特定空间,在这一特定空间中主要以经济活动为主等。

第二,由于海外园区数量巨大,出现很多不同于国内,也不同于东道国园区的特征与类型,因此,应扩大研究案例和类型的样本量,准确分析和讨论中国海外园区的类别特征,并与现有理论进行比较,总结其基本特征,力求得出新的研究成果与观点。

第三,现有基于制度和变迁的海外园区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和新探索,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未来,应在验证和应用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海外园区制度和变迁理论研究新发现,探索基于“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研究基础上“制度和变迁”理论研究新成果。

第四,有关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研究应将研究重点从宏观尺度经济发展转向微观尺度经济贸易发展研究。例如,学者们可以讨论海外园区和东道国如何利用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如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来改善海外园区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宏观尺度贸易网络结构上。

第五,中国学者应探讨如何将中国的规划模式纳入东道国的规划体系,并制定海外园区规划框架与指南,用于指导“一带一路”海外园区建设,如研究哪些规划内容可以直接复制、哪些需要调整、哪些需要放弃、哪些需要创新,既可以服务“一带一路”海外园区规划建设,又可以完善中国规划体系以及区域与国别规划研究,实现中国标准的输出。

第六,加强与海外学者和机构的合作与交流,超越现有研究视角,探索从更广的视野和更多的方法,研究海外园区相关研究的前沿课题,其中,海外园区与投资的实地调研与考察是目前学者最需要,也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 3.海外园区比较研究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自由经济区与海外园区之间存在异同之处,有必要对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研究(Ye, et al., 2020)。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才能克服差异带来的挑战,探索实现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这些差异主要包括管理结构、利润模式、环境标准、土地制度和法律制度。

海外园区的管理层由中国企业和东道国组成(Meng, 2003),所以其决策机制要比国内企业复杂,这也影响着园区的开发和盈利模式。例如中白工业园管理结构由双方组成,但责任不同,白俄罗斯负责园区投资和建设准入,而中国负责规划建设和招商,这就存在一个双方合作与沟通的问题(赵钊, 2019)。海外园区不同的管理结构导致中国投资方有着不同于国内的盈利模式。国内大部分自由经济区是由中国政府建设,除租赁土地和财产的收入外,还拥有企业税收收入。海外园区一般由中国建设和管理,主要盈利模式是土地租金和物业服务收入,企业税收收入仍归东道国所有。同时,为了提高服务水平和东道国的投资便利性,中国必须承担一些东道国地方政府的服务职能,如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在园区内设立海关、越南龙江工业园建立消防机构。这些政府职能增加了海外园区的运营成本(孟广文等, 2019; 王淑芳等, 2022)。此外,园区以外的基础设施通常难以满足园区建设和运营的需要,特别是在非洲,即使园区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但园区外东道国的配套设施往往不能满足园区的发展需要。

海外园区数量不断增加,加强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联系。如何保持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东道国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不容忽视。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由经济区,当时的环境标准较低,使得投资准入和运营成本相对较低,然而,21世纪以来,环境标准、“双碳”目标提高了海外园区的投资准入和运营成本,导致企业利润空间缩窄。

法律纠纷也是海外园区发展中产生的另一个典型问题。由于中国和东道国的法律制度不同,中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的法律程序和问题不熟悉,容易产生法律纠纷,影响海外园区的可持续发展。除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外,最典型的例子是吉布提政府和“迪拜世界”之间关于多哈雷多用途港的法律纠纷,这给吉布提国际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经济损失(马祥雪, 2020)。自由贸易区所在的港口最初由“迪拜世界”租赁开发,但由于建设延误,吉布提港务局收回港口,转租给招商集团等中国公司开发建设。“迪拜世界”在伦敦的一家法院起诉了吉布提政府,目前这起法律案件尚未结束。

此外,土地使用权期限(从99年到45年)的变化是影响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因素,如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第一期6平方千米土地使用期为99年,而第二期4平方千米土地使用期则变更为45年,而两块土地之间还夹有一块私人土地,这种土地使用权的变化和不一致性影响到海外园区的整体开发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虽然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海外园区建设给中国和东道国带来了许多好处,但也引起了一些质疑和挑战,例如,“一带一路”海外园区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工具、决策不透明以及容易引起债务陷阱和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中有许多都是基于意识形态和针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战略,因此它们缺乏严格的理论支持,这些问题容易对“一带一路”海外园区建设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该用科学的学术话语来回答这些质疑与挑战。

为支持中国海外园区的可持续发展,未来研究可从海外园区的盈利模式、综合环境影响评价、土地制度与利用、海外园区及其国际贸易网络对碳排放的贡献等方面深入研究。

## 五、结论

本文总结了“一带一路”中国海外园区研究的主要进展,并讨论了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既往的海外园区相关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中文文献数量比英文文献数量多;“境外经贸合作区”“海外工业园区”“一带一路”在文献关键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第二,研究内容是基于地理学、经济学、城市规划、国际政治和国别研究等跨学科视角,

如海外园区不同类型的分类研究,运用制度和文化变迁理论的海外园区研究,贸易网络与海外园区贸易效应,城市规划体系融合、海外园区在东道国、地区甚至世界的经济和环境影响,新加坡、日本和中国海外园区的经验和教训等方面。尽管研究内容多样,但大多数研究缺乏对东道国基本国情、与中国相关地缘政治热点的研究以及海外园区理论框架与内在机制等问题的深入探讨,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更好地认识海外园区,促进其未来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在海外园区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国内自由经济区与海外园区比较研究问题,如管理模式、盈利模式、城市规划、法律问题、土地问题、环境影响等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一带一路”海外园区未来研究应继续拓宽海外园区研究视角,强化国内外合作渠道与网络,完善其机制研究,构建理论框架,提炼出适用于不同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下的海外研究一般性结论,服务“一带一路”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

## 参考文献

- [1] HADDAWAY N R, WOODCOCK P, MACURA B, et al. Making literature reviews more reliable through application of lessons from systematic reviews [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15, 29(6), 1596–1605.
- [2] MOHER D, LIBERATI A, et al.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the PRISMA statement [J].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2009, 151(4): 264–269.
- [3] MENG 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ree economic zones: a case study of Tianj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 Peter Lang, 2003: 1–60.
- [4] LIANG Y, ZENG J, KUIK C, et al. Policy transfer and scal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A case study of the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21, 31(5): 733–746.
- [5] SONG T, LIU W, LIU Z, et al. Chinese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n Southeast Asia: An examination of policy mo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8, 28(9): 1288–1306.
- [6] WANG S, MENG G, ZHOU J, et al. Analysis on geo-effects of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A case study of Cambodia Sihanoukville Special Economic Zone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21, 31(5): 712–732.
- [7] LIU Z, DUNFORD M, LIU W. Coupling national geo-political economic strategie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hina–Belarus Great Stone Industrial Park [J]. *Political Geography*, 2021, 84: 102296.
- [8] SONG T, SUN M, LIANG Y, et al. Variegated transnational partnerships: Multi-scalar actor networks in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21, 31(5): 664–680.
- [9] LIU H, WANG T Y.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ransnational policy transfer: The China – 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as a case study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1, 41(3): 103–114.
- [10] SONG Z, CHE S, YANG Y. The trade net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to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8, 28(9): 1249–1262.
- [11] WANG X.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of Industrial Parks in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M]. Jiangsu: Jiangsu People's Publisher, 2019.
- [12] SHEN X. Discussion on the Layout Pattern of Modern Industrial Parks: Taking the Eastern Industry Zone in Ethiopia as an Example [C]. Annual National Planning Conference 2009, Tianjin, 2009.
- [13] ZHANG X, BAI B, LIU J. Planning and Design Practice of Large-Scale Overseas Parks: Taking the Series Planning of China–Belarus Industrial Park as an Example [C]. Annual National Planning Conference 2015, Guiyang, 2015.
- [14] WANG X, ZHU K, LI Y, et al. Applicability and prospect of China's development zone model in Africa [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17, 27(6): 860–874.
- [15] INKPEN A C, PIEN W. An examination of collaboration and knowledge transfer: China – 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6, 43(4): 779–811.
- [16] BRÄUTIGAM D, TANG X. Economic statecraft in China's new overse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oft power, business or resource security? [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 88(4): 799–816.
- [17] FARDELLA E, PRODI 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mpact on Europe: An Italian perspective [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7, 25(5): 125–138.
- [18] DE SOYRES F, MULABDIC A, MURRAY S, et al. How much wil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duce trade costs?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 159: 151–164.
- [19] GONG X.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J]. *The Pacific Review*,



- 2019, 32(4): 635–665.
- [20] GOODFELLOW T, HUANG Z. Manufacturing urbanism: Improvising the urban – industrial nexus through Chinese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J]. *Urban Studies*, 2021, 59(7):1459–1480.
- [21] WORLD BANK. Chinese investments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lessons learned[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1.
- [22] BRÄUTIGAM D, TANG X. “Going global in group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verseas[J]. *World Development*, 2014, 63: 78–91.
- [23] CORRE P L. Chinese investments in European countrie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 In: *Rethinking the silk road*. Springer, 2018: 161–175.
- [24] MALISZEWSKA M, VAN DER MENSBRUGGHE 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nomic, poverty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8814)*, 2019.
- [25] FEI D, LIAO C. Chinese Eastern Industrial Zone in Ethiopia: unpacking the enclave [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20, 41(4): 623–644.
- [26] ASCENSÃO F, FAHRIG L, CLEVENGER A P, et 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J].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18, 1(5):206–209.
- [27] TEO H C, LECHNER A M, WALTON G W, et al.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 *Environments*, 2019, 6(6): 72.
- [28] TRACY E F, SHVARTS E, SIMONOV E, et al. China’s new Eurasian ambitions: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7, 58(1): 56–88.
- [29] ANDRIĆ J M, WANG J, ZOU P X W, et al. Fuzzy logic – based method for risk assessment of Belt and Roa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19, 145(12): 04019082.
- [30] IRINA G, IRINA Z.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green growth in the east of Russia [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16, 7(5): 342–351.
- [31] HARDIMAN R.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pringer, 2020: 173–201.
- [32] PHELPS N A, WU F. Capital’s search for ord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ingapore’s overseas parks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9, 28(1): 44–54.
- [33] YEOH C, LIM D, KWAN A.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low-cost investment enclav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Singapore’s Industrial Parks in Riau, Indonesia [J]. *Journal of Asia-Pacific Business*, 5(4), 43–65.
- [34] PEREIRA A A. St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ingapore’s industrial parks in Batam and Suzhou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4, 16(2): 129–144.
- [35] PHELPS N A. Gaining from globalization? State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domestic economic impacts—the case of Singapore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83(4): 371–393.
- [36] WONG T C, GOLDBLUM C. The China – 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a turnkey product of Singapore? [J]. *Geographical Review*, 2010, 90(1): 112–122.
- [37] ZENG D Z. Building a Competitive City through Innovation and Global Knowledge: The Case of Sino-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7570)*, 2016.
- [38] ZHAO M, FAROLE T. Partnership Arrangements in the China-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Lessons for Joint Economic Zone Development [C]//Farole T, Akinci G, ed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rogress, Emerging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1.
- [39] PEREIRA A. Th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experiment: the case of China-Singapore 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4, 13(38):173–193.
- [40] LIM K F, HORESH N. The “Singapore Fever” in China: policy mobility and mutation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6, 228: 992–1017.
- [41] LIU H, WANG T Y. China and the “Singapore Model”: perspectives from mid-level cadr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8, 236: 988–1011.
- [42] LIU Z G, DUNFOLD M, LIU W D. Coupling national geo-political economic strategie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hina-Belarus Stone Industrial Park [J]. *Political Geography*, 2021, 84: 102296.
- [43] MIAO J. Parallelism and evolution in transnational policy transfer networks: the case of Sino-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SIP) [J]. *Regional Studies*, 2018, 52(9): 1191–1200.
- [44] KUMAR N. Determinants of location of overseas R&D activit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e case of US and Japanese corporations [J]. *Research Policy*, 2001, 30(1): 159–174.

- [45] PAK Y S, PARK Y R.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FDI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motives of Japanese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5, 40(3): 254-266.
- [46] JIANG Y. Competitive partners in development financing: China and Japan expanding oversea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J]. *The Pacific Review*, 2019, 32(5): 778-808.
- [47] YE C, LI S, ZHUANG L, et al. A comparison and case analysis between domestic and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of China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20, 30(8): 1266-1282.
- [48] 刘卫东, 宋周莺, 刘志高, 等. “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进展 [J]. *地理学报*, 2018(4).
-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 [R].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 2022.
- [50] 孟广文, 隋娜娜, 王雪. 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建设与发展 [J]. *热带地理*, 2017(2).
- [51] 孟广文, 王春智, 杜明明, 等. 尼日利亚奥贡广东自贸区发展历程与产业聚集研究 [J]. *地理科学*, 2018(5).
- [52] 孟广文, 杜明明, 赵钊, 等. 中国海外园区越南龙江工业园投资效益与启示 [J]. *经济地理*, 2019(6).
- [53] 孟广文, 赵钊, 周俊, 等. 泰中罗勇工业园“园中园”模式与效益评价 [J]. *地理科学*, 2020(11).
- [54] 张菲. 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模式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J]. *国际贸易*, 2013(3).
- [55] 叶尔肯·吾扎提, 张薇, 刘志高.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海外园区建设模式研究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4).
- [56] 沈正平, 简晓彬, 赵洁.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模式研究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 [57] 姚一涵. 我国海外园区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D]. 山东: 山东大学, 2021.
- [58] 于淙阳. 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土地利用模式与效益研究 [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20.
- [59] 周俊, 于淙阳, 孟广文, 等. 中国农业产业型海外园区土地征用与利用模式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4).
- [60] 马祥雪. 中国在吉布提投资与建设项目影响研究 [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20.
- [61] 赵钊. 中白工业园发展模式及产业集聚研究 [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19.
- [62] 梁育填, 周克杨, 张家熙, 等.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园中园”发展模式与案例研究 [J]. *地理科学*, 2021(6).
- [63] 王爱华. 海外园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境外投资新模式研究 [J]. *生态经济*, 2013(10).
- [64] 刘卫东, 姚秋蕙. “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 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 [J]. *地理学报*, 2020(6).
- [65] 宋涛, 刘卫东, 高波阳, 等. 合作伙伴关系视角下的海外园区政策移动性研究: 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 [J]. *地理学报*, 2020(6).
- [66] 王姣娥, 杜方叶, 刘卫东. 制度与文化对嵌入式技术海外转移的影响: 以蒙内铁路为例 [J]. *地理学报*, 2020(6).
- [67] 高波阳, 刘卫东, 宋涛, 等. 社会变革和制度文化制约下的“多尺度嵌入”: 以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为例 [J]. *地理研究*, 2020(12).
- [68] 刘志高, 王涛. 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多尺度耦合建设机制: 以中白工业园为例 [J]. *地理学报*, 2020(6).
- [69] 赵赛. 基于制度环境视角的中国 OFDI 的贸易效应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国家的实证分析 [J]. *经济问题探索*, 2022(1).
- [70] 陈伟, 叶尔肯·吾扎提, 熊韦, 等. 论海外园区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作用: 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 [J]. *地理学报*, 2020(6).
- [71] 王淑芳, 闫语欣, 孟广文.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政策移动研究: 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 [J]. *地理科学*, 2022(7).
- [72] 孙冰. 我国海外产业园区空间布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质量的影响研究 [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12).
- [73] 徐俊, 李金叶. “一带一路”沿线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贸易效应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4).
- [74] 严兵, 谢心荻, 张禹. 境外经贸合作区贸易效应评估: 基于东道国视角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7).
- [75] 李金叶, 沈晓敏. 境外园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 [J]. *华东经济管理*, 2019(12).
- [76] 许培源, 王倩.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理论创新与实证检验 [J]. *经济学家*, 2019(7).
- [77] 杨丽, 丁一, 文淑惠. 境外经贸合作区、制度禀赋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J]. *改革与战略*, 2020(2).
- [78] 支宇鹏, 陈乔. 境外产业园区、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9(11).
- [79] 张宏, 李洲旭, 刘震. 海外园区对中国 OFDI 效率的影响研究 [J]. *亚太经济*, 2021(5).
- [80] 程中海, 屠颜颖, 孙红雪.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网络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J]. *世界地理研究*, 2022(3).
- [81] 陈继勇, 刘焱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贸易潜力的影响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9).
- [82] 孔庆峰, 董虹蔚. “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12).
- [83] 唐宜红, 顾丽华. 贸易便利化与制造业企业出口: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9(2).
- [84] 郑智, 刘卫东, 宋周莺, 等. “一带一路”生产网络及中国参与程度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7).
- [85] 邹嘉龄, 刘卫东. 2001—2013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分析 [J]. *地理科学*, 2016(11).

- [86]宋周莺,车姝韵,张薇.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特征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4).
- [87]王博,陈诺,林桂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及其影响因素[J].国际贸易问题,2019(3).
- [88]郑智,刘卫东,宋周莺,等.“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及中国经济贡献分析[J].地理研究,2020(12).
- [89]李磊,孟广文.中国境外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与空间规划策略研究[J].规划师,2020(9).
- [90]王兴平,赵胜波,张茜.“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践研究[J].城市规划,2021(6).
- [91]陈骁,王兴平.中国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拓展和应用研究[J].规划师,2019(19).
- [92]赵毅,唐历敏.一次成功的境外城市规划实践: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控规为例[J].华中建筑,2009(6).
- [93]李扬.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起步区概念规划方案[J].上海建设科技,2014(6).
- [94]王骏,张照,温晓诣.中国在非洲各国的若干规划实践与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10(4).
- [95]施一峰,王兴平.中国—白罗斯境外合作园区特征及规划研究[J].上海城市规划,2019(3).
- [9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R].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7.
- [9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R].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7.
- [98]关利欣.中新境外工业园区比较及启示[J].国际经济合作,2012(1).
- [99]赵政原.日本在东南亚的海外产业园区投资建设模式[J].亚太经济,2021(5).
- [100]卢进勇,裴秋蕊.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19(4).
- [101]马学广,鹿宇.中国海外园区发展的动因、实践与模式:以青岛市为例[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102]周建军,于爱芝,李一丁.“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双边贸易发展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2020(7).

## Research on China's Overseas Park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Meng Guangwen Wang Ran Wang Shufang

**Abstract:** The overseas free trade zones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overseas parks) are the spatial carrier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nd a new model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y not only promote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but also facilitat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search on overseas parks has been increasingly attracting attention in academia and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However, there still lacks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overseas parks. Based on research obtained from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Web of Science (WOS),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overseas park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earch on overseas parks mainly includes comprehensive studies based on types and case perspectives, deductive studies based on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perspectives, economic impact studie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regional economic perspectives, plann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 studies based on urban planning perspectives, and overseas experience and critical studies from foreign scholar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tics. Despite the diverse research content and significant progress, there are still issues such as theoretical and mechanistic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overseas park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ow to address the attention and criticism of foreign scholars. Future research on overseas parks should broade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exp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hannels and networks, impro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struction and case studies, summarize general conclusions applic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parks under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and ser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park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Overseas Free Economic Zones;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Overseas Parks; Systematic Review

(责任编辑:江 夏)